

广西近代灾荒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刍议

——大数据时代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突破“同质化”倾向的思考

薛 辉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工作部, 广西 南宁 530023)

摘要:近代广西是近代中国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一个历史缩影。广西近代灾荒史研究既有助于更丰富地认识中国近代灾荒的历史图景,也是拓展广西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必然要求。广西近代灾荒史研究应以“整体史”为目标和取向,在“区域史”的观照下转化学术视角,从“数据挖掘”角度吸取和运用跨学科方法,加大专题数据库建设与整合,加强和推进区域比较研究,从而揭示和把握中国近代灾荒史的“整体史”特征,克服同质化倾向。

关键词:中国近代灾荒史;广西近代灾荒史;区域史;同质化;研究方法;数据挖掘

中图分类号:K29;X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6)04-0073-09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6.04.014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about the Research of the Modern Famine History Guangxi Province

— The Breakthrough of Homogenization about the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Modern Famine History in the Bigdata Age

XUE Hui

(Department of the Party Committee, Guang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Nanning, Guangxi, China 530023)

Abstract: Modern Guangxi is not only a historic miniature of the changing time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and the necessity to enlarge the research field of the modern history in Guangxi province. With the integral history as the target and orient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integration of data with special su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mining, the research of regional comparison is strengthened and pushed forward to show the features of integral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famine history to overcome the tendency of homogenization, and the method of interdiscipline with data mining are absorbed and used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modern famine history in Guangxi province.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 famine history; modern famine history in Guangxi province; regional history; homogenization; research method; data mining

众所周知,近代广西不仅是近代中国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具体写照,而且也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广西近代史研究素来为学界所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研究视野的逐渐下移和研究对象的不断拓展,探讨普

罗大众日常生活社会史研究日渐复兴。关注当下的社会问题,体现史家的人文关怀,重视历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的结合,是近年来史学界共同关切的基点。在这一股学术发展潮流中,中国灾荒史研究日趋繁荣,尤其是中国近代灾荒史领域发展迅猛,在

收稿日期:2016-07-29

基金项目:2013年度广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危机与应对——广西近代灾荒史研究”(SK13LX599);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门户建设历史经验研究——以广西边疆开发治理为例(1644—1949)”(15FZS001)。

作者简介:薛辉(1986—),男,浙江玉环人,讲师,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环境史、灾荒史、边疆区域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李文海先生等前贤时俊的积极呼吁和努力躬行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一个现实却又不得不令人感到有所缺憾——在国内其他地区近代灾荒史研究正如火如荼进行,并不断有专著问世,乃至出现同质化研究倾向的情况下,广西近代灾荒史作为中国近代灾荒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现状仍显滞后,虽有一些论文探讨了广西近代灾荒的多个层面,但至今还未有一部专著问世。有鉴于此,笔者不揣鄙陋,在简要回顾和分析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业绩和存在的不足的基础上,思考和探讨深入推进广西近代灾荒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希冀能为突破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同质化倾向提供些许思路和参考。不正之处,尚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成绩与局限: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 简要学术史回顾

严格地说,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灾荒史研究,国内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当时学者的努力,该领域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高潮,但是爆发的抗日战争中断了后续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灾荒史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有些成果问世,也多从灾害学角度探讨灾荒的发生规律。之后“文革”爆发,相关研究再度被迫中断。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史复兴和国际社会对灾荒的倍加重视,灾荒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在以李文海先生为首的“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下重新焕发活力,成果不断涌现,繁荣至今。可以说,正是李文海先生怀着强烈的时代感、使命感和历史透视感,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处,寻找和切入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契合点,开辟了新时期的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领域,其影响可谓深远。“回顾3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灾荒史研究,同其他学科相比,是在一个起点不同的条件下取得了同样的甚至可以说是更加迅速的发展。这

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值得自豪的成就。”^[1]2010年8月21日—22日,“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暨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李文海先生在会上不仅对30年来的灾荒史研究作了简要的评价,而且还具体概括了在此期间学界所取得成就的四个主要表现。^①我们从其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灾荒史研究伴随岁月的流逝已逐渐由涓滴细流发展为一股颇具规模的学术潮流——灾荒史研究是当下历史研究中的重要热点主题之一,近代灾荒史研究已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领域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丰富我们对近代历史图景的认识开拓了更加宽广的视野。

事实表明,30多年来的中国灾荒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无论是在数量积累层面还是学术质量提升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数量颇为可观的灾荒史研究综述类文章即是一个力证。^②限于篇幅和文章主题结构,笔者在此简要归纳罗列学界有关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或含有近代灾荒史部分)的代表性综述文章如下:

从研究综述时段看,杨晓辉、阎永增等人分别论述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近代灾荒史取得的主要成果^[2-3],武艳敏探讨了五十年来的“民国”救灾史研究的主要情况^[4],朱浒则从宏观层面梳理和考察了20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的总体概况^[5]。

从研究地区看,包庆德、阿利亚·艾尼瓦尔、朱馨薇分别探讨了有关清代内蒙古、新疆和河南省的灾荒研究概况^[6-8],张春艳则整理了近代东北灾荒研究的现状^[9]。在此附提一下,苏全有曾与多名学生合作整理了多篇有关近代华北和河南的灾荒史研究的成果刊发在《防灾科技学院学报》等刊物上。^③

从灾荒研究内容看,卜风贤探讨了农业灾荒史的相关动态^[10],邵永忠、于运全分别梳理了20世纪以来荒政史和中国海洋灾害史研究的主要成

①李文海先生概括的主要表现为:“社会和学术界对灾荒史学科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越来越高,关注和支持的程度越来越大;发掘、整理了一大批内容丰富的珍贵历史资料,完成并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使灾荒史学科的理论框架逐步清晰,学术内容日益充实,资料依据更加充分,在学科建设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学风严谨的专业队伍”,“同国外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日趋活跃”。详见文尾参考文献[2]。

②笔者最近于2016年7月25日利用中国知网检索并整理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相关综述文章,自1992年至2016年7月24日止,共计48篇。其他含有灾荒史研究综述类文章则更多,如部分环境史研究综述中亦含有“灾荒研究”成果论述。

③《防灾科技学院学报》每年均会不定期刊登灾荒史研究相关专题论文和综述类文章。

果^[11-12],马维强等人则从社会史视野考察了中国蝗灾史研究的相关情况^[13]。

从研究对象时间看,蒋积伟探讨了学界对新中国建国初期灾荒史的研究成果^[14],文姚丽则简要梳理了民国灾荒史研究的概况^[15]。

从史料整理和数据库建设看,夏明方从大数据与数据库建设的角度撰文回顾了学界数十年来的努力和成绩,并强调学界对灾害史料建设始终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形成了较为深厚的学术滋养土壤。^[16]

从研究理论与学术反思看,孙语圣探讨了近年来学界运用的主要方法论问题^[17],叶宗宝则撰文梳理了当前灾荒史研究中存在人文视野关怀缺失的不良倾向^[18],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此前夏明方对此状况的反思和担忧^[19]。

从研究个案看,研究者不仅梳理了“丁戊奇荒”^[20]、1934年东南旱灾^[21]等代表性灾荒的研究现状,而且还分析和探讨了从事灾荒研究的学者个人(如李文海^[22]、夏明方^[23])的学术影响力和成就。

以上文章仅是笔者目力所及的整理,难免挂一漏万。论者指出:“研究者对以往研究中感兴趣的领域所做的分析,是每一项科学研究的起点。没有这一步,研究者就不可能综合、全面地了解这个世界,他们也不可能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取得成就。在科学研究中,孤立的研究者注定要重复前辈们所犯的错误。”^[24]当我们面对上述各位研究者所提相关成果数量迅速增长的现状时,似应不宜过分自喜。相反,我们应正面直视当前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存在的瓶颈和问题,尤其是存在的同质化倾向。早前,笔者曾撰文从整体性研究、区域灾荒史研究、专题性研究和史料整理建设工作等四个方面简要回顾了30多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丰硕成果,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25]在此,试从理论体系、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层面予以进一步探讨,以期日后努力改进、完善和自勉自警。

一是理论研究不够。目前,经过学界持续30多年的学术积累,部分论题成果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诠释框架,但从总体上看至今仍未形成某种代表性或权威性的理论模式。具体言之,大多数成果集中于灾荒的个案研究,或就某种灾害分析时空分布与成因,或以某次灾荒为对象考察赈济救济制度和措施成效,致使一定程度上在理论研究

层面缺乏宏观的深刻思考和学理性分析。以广西近代灾荒史研究为例,无论是考察晚清时期抑或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研究者均以史实还原为主,很少有人从学理性角度思考该研究的意义,更遑论探讨其在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前,尚未正式出版探讨广西灾荒史或广西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专著,就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从研究灾害种类的内容成果看,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探讨水灾、旱灾多于地震、雹灾、瘟疫等其他灾害。从研究区域而言,亦存在地域研究的不平衡性,即北方多于南方。这种缺乏足够理论深度的研究现状,是当前灾荒史学界亟应加倍关注的问题。

二是深入研究的力度还不强。因理论方面存在若干模糊不清甚至不重视的情况,不少研究者以平铺直叙的还原史实类型文章过多。同时,由于缺乏制度史等宏观层面的思考和理论观照,部分研究者在分析近代减灾、防灾、避灾、抗灾的措施和具体实践等各方面的内容时,存在较为严重的先入为主现象,更有甚者在开展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存在生搬硬套的情况,致使简单化、同质化的不良倾向开始蔓延。由此,缺乏研究力度的同质化成果不断涌现,这种现状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

三是研究方法和手段尚欠丰富和多样化,学术视野仍需拓展。“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应用,正是灾害史学科的优势之所在,也是灾害史学科充满活力及动力之基础。”^[26]尽管应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手段推动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已是学界共识,部分研究者也注意到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有助于研究课题的深入,并在实践中力求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融汇到灾荒史研究之中,但从目前来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相互之间依然沟通不够,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真正应用仍较为薄弱,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探讨及深入地研究某个具体课题的现象也还不多见。就广西近代灾荒史研究而言,目前的绝大多数成果均以史学工作者为主,成果主要集中在资料搜集整理、分析灾害成因和时空分布、灾荒个案研究等方面。

总之,从一定程度上讲,尽管许多成果的具体内容针对不同时空范围内的灾荒,但其中的绝大多数研究都存在质量和结构等不同层面的缺陷,即在研究思路和写作框架上呈现出近乎千人一面的“微型叙事”

型的重复话语建构。论者断言,如果不改变这种盛行状况,灾荒史研究只能是一种粗放型发展。因此,对以往研究模式的方法论基础进行深入反思,促进研究视角和视野的多元化转换,是遏制这种粗放型势头的关键步骤。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刊发“灾荒史研究的新视域”笔谈系列4篇文章,尽管“各篇文章论述的主题内容虽相差甚大,但无论是对新兴意味的环境史和新文化史视野的倡导,还是对国际化和国家视角的实践脉络的再发掘,其关怀主旨都是力图开拓灾荒史研究的新视域,以推动其向集约型方向发展”^[27]。笔者相信,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在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中倾注人文关怀日渐成为学界共识的背景下,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终将会突破瓶颈更上一层楼。

二、研究理路:广西近代灾荒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如前所述,虽然专门考察广西灾荒史或广西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专著尚未问世,但经过多年努力和积累,已有部分著作和论文对广西近代灾荒史的各个图景和断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相关史料建设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28]而且近年来,探讨近代广西灾荒与赈灾救济问题受到较多关注。但我们也应从中看到,目前的广西近代灾荒史研究陷入了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同质化倾向的窠臼之中。因此,针对存在局限的研究现状,从区域视角探讨深入推进广西近代灾荒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实有必要。

首先,重视并正确运用“区域史”的研究视角。“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史研究逐渐复兴并繁荣起来,成为新时期史学发展的表征之一。区域史研究的兴起,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29]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理念,区域史研究的价值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赞同,在社会经济史尤其是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获得较为广泛的运用。傅衣凌先生指出:“在中国,由于社会历史发展在地域上严重的不平衡性,区域性研究尤其必要。区域性研究不仅可以发现中国各地区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而且通过对这些特殊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说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30]对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来说,开展区域性研究,对于更加深入地了解 and 总结近代全国各地的防灾、减灾、抗灾经验的区域性特

点,也是大有裨益。尽管灾荒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同样的痛苦,但如果在研究中忽视明显存在的区域差别和区域特点而一味只是从整体上开展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话,那么我们将很难对中国近代灾荒有清晰的认识。换言之,只有不断深入区域性研究,才能更好地深化中国近代灾荒史的“整体史”研究。此外,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中国灾荒的发生明显受到地方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只有开展区域史研究,才能更好地揭示“地方性”因素,进而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更深入地观察地方社会。就广西而言,由于地形复杂多样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水平的不均,近代灾荒呈现出明显的时空不平衡性,这就决定了政府和地方社会在实施赈济救灾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如以工代赈、实物救济等。如果只是顾及灾荒的一般性特征和规律,而忽视存在的区域差别与区域特点,则势必对灾荒与政府赈灾救济、地方社会应对的种种千丝万缕关系的认识有失偏颇。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尝试通过区域对比,运用联系和比较、归纳与演绎等不同方法来分析和探讨广西内部不同地理单元灾荒的区域性因素、普遍性因子,从而更好地揭示广西近代灾荒的轨迹和特点,加深对灾荒史的“同情之理解”。进一步而言,更可将区域比较拓展为广西近代灾荒与周边西南地区近代灾荒的省际比较,进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通过多层次、多途径的比较构建整体史。唐力行等人认为:“在将区域研究引向整体史研究的努力中,除了纵向关注国家在地域社会中的角色地位外,另一条途径就是对不同的地域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将各个既互相独立又彼此联系的区域联结起来加以考察,超越区域的疆界来认识区域发展的特征,以揭示区域间的整合所披露的整体史特质。”^[31]

其次,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的内容与结构。如前所言,当前的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存在同质化不良倾向,大多平铺直叙灾情、救灾赈济过程,然后给予评价,而缺乏深入分析近代减灾、防灾、避灾、抗灾等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与赈济措施、具体救灾实践之间的差距以及地方差异,导致研究力度不够强。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广西近代灾荒史研究时若想突破研究窠臼、事半功倍,就必须进一步明确研究内容和结构。具体来说,内容方面,除了探讨和剖析广西近代灾荒的背景、

原因、时空分布、发生过程、政府和民间的灾害救济、疫病防治、社会医疗与服务等这些问题外,还应特别重视通过资料整理思考灾荒在近代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问题,探究灾荒与近代广西社会发展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凸显区域特色。当然,针对不同灾荒个案的具体研究和思考,我们则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史料状况完善具体内容,而非削足适履。至于具体的研究结构,我们在开展相关研究的过程中则可以采取两种叙事方式:一种是按照历史时间的先后顺序纵向梳理近代广西发生的灾荒;一种是打破时间顺序,按照各种灾荒进行横向专题式研究。前者时间线索鲜明、脉络清晰,但缺乏专题式探索;后者能够深入开展专题式研究,但时间脉络不清晰。这两种路径各有千秋,具体选择哪种路径要按照研究对象及其史料来确定。叙述方法的不同选择,对广西近代灾荒的历史图景叙事也会有所区别。概言之,第一种方法,更加侧重梳理广西近代灾荒的历史发展轨迹,能够较为准确地呈现广西近代灾荒的历史发展脉络,但可能对整个历史时期的专项活动缺乏整体性把握,比如医疗救护就很可能被拆分在不同时期或阶段中;第二种方法更多地照顾了灾荒过程中的具体救济等活动,如灾害救济、医疗以及社会服务等。毫无疑问,在资料充实的前提下,融会贯通地运用上述两种分析方法,势必将会极大地推动广西近代灾荒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再次,运用、扩展与延伸跨学科研究法。“多学科交叉方法的恰当把握及应用,对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及客观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32]灾荒史研究历来强调运用多学科方法开展研究,广西近代灾荒史自然也不例外。在此,多学科不只是史学内部的交流与借鉴,更多的是侧重运用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交叉和拓展。从社会科学来说,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近些年来学界比较流行的一个理论视角。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二者的关系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重叠的互动,研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是研究来自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和来自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33]。论者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史学意义:“对于区域史、地方史而言,从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出发,探索地方性与总体性间的关系,探索边缘与中心的关系,探索微观世界与宏观历史的关系,这似乎真正使地方史、区域史的个案研究带有了总体史的特征,从

而提高了其学术境界与价值。”^[34]通过探讨“国家与社会”这一组关系,深入分析广西近代灾荒中广西地方社会与国家(包括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化脉络,对深化认识近代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近代中国政府权力有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随着国家权力的上升,必然要压缩社会力量和地方力量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说,探讨这个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轨迹,才有可能使广西近代灾荒史研究不落俗套,摆脱同质化研究的窠臼。在此需要强调的是,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广西近代灾荒史,并不意味着放弃整体史的视野。相反,我们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还应将全国各地的灾荒进行比较研究,进而由此构建“灾荒的整体史”。从自然科学来说,最典型的莫过于各种史学研究主题数据库的建设和使用。夏明方在构想一种在生态观视野下建设的灾害信息数据库时即指出,从技术路径上来说,当今世界蓬勃兴起的“大数据革命”可以将大量被尘封的历史文献资料在短时间之内得到大规模的整理和公开,“此种清代灾害信息集成数据库若能如期建成,将会大大方便全球变化、灾害研究领域中文献的使用,并可望形成完整的一套史料考订和信息化集成的方法。这样的数据库也不仅仅是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应是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分工合作的产物,若此将更有利于提高历史灾害数据库的完备性、可靠性以及科学问题的针对性,而兼容、便捷的信息化数据,亦便于未来学者对历史灾害规律、发生机制以及人类应对等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科学研究”^[16]。就广西而言,若想深入开展近代有关各类防灾减灾制度、各种灾害防控监测预测预报、致灾因子与驱动机制、环境变动背景下灾害演变与风险管理等各项研究,如不利用各种专题数据库进行综合分析和整理,其结论可想而知,乃至更有可能偏离事实。

最后,需时刻关注和重视几个问题。一是尽可能地挖掘史料,开展数据库建设。“得益于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类的数据化能力和范围在不断扩张。进入21世纪,这种扩张让我们看到大量从宏观到微观、从自然到社会的观察、计算、传播等仪器设备和活动正在快速产生着海量、多样的数据,几乎每个学科领域都在经历着空前的数据爆炸,科学研究正在进入大数据时代……采集、存储、管理、分析和可视化数

据的能力成为科学研究必须适应的新事实。”^[35]实证研究需要有足够的资料来支撑,研究者掌握的材料越充分,其研究结果就越有说服力。目前,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资料建设已有所积累,但广西近代灾荒史资料则相对较少,尤其是纸质资料大多未数字化而被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等单位。因此,尽可能深入广西各地市县发掘各市县档案馆藏的地方志书、近代各个历史阶段的报纸杂志、个人文集等出版物,在充分占有资料并进行整理的基础上,逐渐加大数据库建设力度,是开展广西近代灾荒史研究亟需随时关注的一个问题。二是注意借鉴和转换学术视角。在开展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要避免就区域言区域,应注意转换研究视角。余新忠指出:“往往被视为自然灾害的灾荒,其实并不仅仅是自然性事件,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不但不同空间中人们对灾荒的认知(包括是否成为灾荒)、应对和解释都深深地凝聚着文化的意蕴,特定的文化和情境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乃至左右着灾荒内外的人们行为方式及其对灾荒的记忆,而且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制作的相关文本及其产生的历史记忆,也在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今人对于历史上灾荒的解读和认知。有鉴于此,若将灾荒视为由自然的异常因素所引发的人类文化产品,似乎并不为过。就此而言,从文化史的角度展开中国灾荒研究,本应是中国灾荒史研究的题中之义。”^[36]可见,在考察广西近代灾荒时,可结合社会历史背景,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乃至文化史意蕴深入分析和探讨广西近代灾荒发生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特点,从而更加深入地揭示广西近代灾荒的整体历史轨迹。这种学术视角的转换,也有助于广西近代灾荒史研究突破目前已部分存在的同质化研究倾向的误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就目前来说,囿于资料限制,在广西近代灾荒史视野下开展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还有一定难度,需要研究者在实践中不断积累、探索 and 追求。

三、“数据挖掘”:史学“数字化转向”进程中的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突破“同质化”倾向的些许思考

网络与新媒体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以互联网数

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学习、生活和思维方式——日新月异的社交媒体,在计算机、互联网、多媒体信息处理、云计算等为主体的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不断服务和拓展着人类创造和利用信息流的范围和形式。继云计算之后,大数据在短短过去的数年间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随之在不同的学科内掀起了大数据研究的热潮。就史学领域来说,研究者在探讨大数据时代历史学发展可能的走向、史学家应具有的态度和付出的努力后认为,“大数据时代中的历史研究是一条正在探索的道路,计算历史学可能会成为历史研究发展的一个趋向”^[37]。李红梅则撰文指出大数据对于历史学的影响,从历史证据角度观察是带来史料挖掘和阅读方式的革命,从历史叙述的角度考察是有助于复原真实的历史。^[38]姜义华进一步强调,大数据“使历史资料利用产生革命性变革”,“有助于提升历史活动中大众主体的角色定位”,“推动历史学从庙堂之学走向公众之学”。^[39]其实,早在探讨大数据对历史学的影响之前,史学界即已身体力行地就“数字化转向”进行了较为长期的思考和实践,表明了数字化技术与历史学的密切关系及其对史学研究的推动作用。^[40-44]

身处“互联网+”的时代环境下,大数据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历史学家的史学研究方式——互联网不仅改变着当代日常生活,也在记录和创造着历史,大数据使历史学面临全新机遇和挑战,历史学家不仅仅是在文献、文物和田野调查中研究历史,更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感悟历史,丰富自己的历史感受。2015年8月23日至29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济南召开。^①本届大会共设四个主要议题,分别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情感”“世界史上的革命:比较与关联”“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此次大会以“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为主题之一,既凸显了数字化技术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又反映出史学实践在大数据时代的某些“转折性”特征。^[45]对此,梁晨等人对学籍卡材料的运用和探讨^[46]、陈争平对近代经济统计研究的思考^[47]、龚为纲等人对19世纪“海上丝绸之

^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创办于1900年,每5年举办一届,除一战和二战期间停办外,此前已举办21届,是当今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国际盛会,素有“史学奥林匹克”之美誉。

路”的分析^[48],均为我们思考身处大数据时代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向”,通过深入的数据挖掘开展和深化史学各领域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本。就本文关注的灾荒史研究而言,夏明方在系统回顾有史以来中国灾害史料之发掘、整理和数据化过程的基础上,从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生态史角度和生态史研究范式出发,借鉴大数据思维,对历史时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灾害史学者对中国灾害史料的大规模文献整理与数据化建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批判性分析,进而以清代为例就中国灾害历史数据库建设提出了新构想。^[16]对此,笔者就如何突破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同质化倾向,从“数据挖掘”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思考。

第一,充分融汇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高数据挖掘的软实力。运用跨学科方法推动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走向深入和完善已是学界共识。从学科体系层面引入新理论、新方法,或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通过科际整合和视角转换,将近代灾荒史研究转向更加广泛和深入的问题层面,从而提高数据挖掘的软实力,是“数字化转向”大数据时代深化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内在必然要求和有待继续努力的一个主要方向。当前,社会学、经济学、医学、灾害学等学科已在近代灾荒史研究中得到较多运用,但人口学、心理学、环境社会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模式仍有待引入。以环境社会学为例,该学科主要利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吸收生态学、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跨学科地对自然环境与人类关系进行综合研究——其主旨是在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交互作用中思考和寻求环境问题的社会解决途径、总结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规律。因此,在考察中国近代灾荒史中的灾害赈济与救灾问题时,如能采用环境社会学的结构分析、角色分析、制度分析和比较分析等基本研究方法,探讨不同群体的应对措施和心理文化反应,则可以大大加强相关数据挖掘和资料解读能力。

第二,深化研究领域和内容,丰富数据挖掘的来源途径。目前,仍有部分研究者对“灾荒”概念认识模糊不清,我们可以尝试从不同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层面展开探讨。周琼有关环境史的思考^[49],就向我们展示了一扇明亮的窗口,有助于我们反观近

代灾荒,帮助我们检视和理解近代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理论框架,无疑将会有助于丰富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数据挖掘途径,从而进一步推动该学科向前发展。在区域研究方面,不仅要有灾荒个案的“事件视角”,更要有整体性的“分析框架视野”,借以拓展数据挖掘的来源途径。如在考察地域性或阶段性疾病(如瘟疫)时,既要研究其所处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又要剖析该地区的政治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程度、文化背景等因素,通过探讨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活动的综合作用,进而拓宽近代灾荒研究中的相关内容。诚如前文所言,近代区域灾荒史研究已有一定积累,今后若有所创新,势必将会是整体性宏观研究和个体微观研究的有效结合——研究成果既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具备理论深度,又言之有物、有历史的厚度。正如论者所指:“将区域灾荒史与整体灾害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拓展区域灾害史研究的视角,在研究区域灾害史时,要将区域放入全局中思考,在研究整体灾荒史、宏观灾害史时,也应注意区域特色,改变长期以来区域灾荒史与整体灾害史研究脱节的现实状况。”^[5]

第三,加大专题数据库的建设力度和整合程度,强化数据挖掘的科学性、全面性、可靠性。史学数字化转向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大大提高史学的研究效率,究其原因在于数字化为治史者获取史料创造了便利条件——提升整理、搜集史料的效率,提供快捷的占有史料路径,降低了研究成本。^[50]便捷的电子化储存和搜索引擎,使过去的传统历史学家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古籍资料触手可及,从而改变了数字化时代的历史学家的工作阵地——从屏幕上能看到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把过去和现在更加丰富地联系起来。可以说,大数据时代资料来源的广泛化,使史学研究变得更为全面和准确,它所提供的共享平台(如依靠数字技术建立的各种类型数据库)有助于使研究成果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整合。近代时期的灾荒资料,除了保存在常见的地方志外,主要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公私档案、报纸杂志、统计资料,以及文集笔记、社会调查等历史文献中。这些资料中的部分内容记录灾情比较详细且地域分明、时间连续性强,研究者可以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汇编(如灾害种类,结构分析层面的分层、关系、制度等),从而为日后的赈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参考。因此,整合目前已有的各种专题数据库为

近代灾荒史研究所用,并进一步加大数字化建设力度,是避免当前近代灾荒史研究加重同质化倾向的有力举措。此外,重视和壮大研究队伍,分工构建结构更为合理的研究队伍,也是保证数据挖掘稳定性、可靠性的重要环节。对此,李文海就曾指出从事近代灾荒史研究的两类人员,以灾荒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专业人员(求其精)和在自己的主攻方向上可以随时找到与灾荒史结合的切入点的非专业人员(求其广),并呼吁史学工作者在从事灾荒史研究中要重视的“五个结合”^[51]①

四、结 语

面对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数字化转向已成为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要趋势之一。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题之一“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正是新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史学研究发展重要趋势的具体写照,反映了当前国际历史学界的关注热点。就我国史学发展史而言,史学研究的数据化也已日渐成为21世纪推动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动力。进一步言之,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研究正经历着一场巨大变革,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应用,为中长时段大范围地定量分析丰富的历史图景提供了现实可能。这种变革和可能,不仅反映在史料学领域中的史料来源愈加广泛和史料样态愈加丰富,更体现在跨学科思维下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上——“以往被视为自然科学研究工具的统计学和数学算法、信息处理和存储技术等大数据技术,将应用到历史学研究领域”,从而促使“包括史料结构、研究手段与方法、研究队伍、历史研究面向未来的功用等内容”发生根本性变革。^[52]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预见,大数据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不仅将成为推动史学研究走向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的推动力,而且还会将历史学与社会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紧密结合,真正实现有效推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学术愿景。^[39]

在这股史学数字化转向的浪潮中,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作为拥有肥沃学术土壤的史学领域和分支,理应给予积极回应和思考。广西近代灾荒史是中国近代灾荒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该当列其中。于

是,笔者撰此拙文,希望广西近代灾荒史研究能以“整体史”为目标和取向,在“区域史”的观照下注意转化学术视角,结合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乃至文化史开展相关研究,以克服当前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存在的同质化倾向。进言之,能够从“数据挖掘”角度注意吸取和运用跨学科方法,深化对中国近代灾荒史的认识和探讨,加强和推进区域比较研究,从而揭示和把握中国近代灾荒史的“整体史”特征,最终使之成为具有鲜明实践性和应用价值的学科。

[参考文献]

- [1]李文海. 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稿(代序)[C]//周琼,高建国. 中国西南地区灾荒与社会变迁: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1.
- [2]杨晓辉. 十多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J]. 高校社科信息,1997(3):6-10.
- [3]阎永增,池子华. 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1):70-74.
- [4]武艳敏. 五十年来民国救灾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120-124.
- [5]朱浒. 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J]. 清史研究,2003(2):104-119.
- [6]包庆德. 清代内蒙古地区灾荒研究概况[J].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4):7-13.
- [7]阿利亚·艾尼瓦尔. 清代新疆自然灾害研究综述[J].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6):49-57.
- [8]朱馨薇. 清代豫省灾荒史研究回顾与展望[J]. 史学月刊,2015(5):114-119.
- [9]张春艳. 近代东北灾荒史研究述评[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30-34.
- [10]卜风贤. 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J].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2):2-9.
- [11]邵永忠. 二十世纪以来荒政史研究综述[J].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3):2-10.
- [12]于运全. 20世纪以来中国海洋灾害史研究评述[J].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12):8-17.
- [13]马维强,邓宏琴. 回顾与展望: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蝗灾研究[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1):132-143.

①“五个结合”,即“社会工作者同自然工作者的结合,学术研究的开拓创新与历史资料的发展整理相结合,基础研究同应用研究的结合,中外学者的结合,学术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的结合”。

- [14] 蒋积伟. 建国初期灾荒史研究述评[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8(4): 100-105.
- [15] 文姚丽. 民国灾荒史研究述评[J]. 社会保障研究, 2012(1): 166-181.
- [16] 夏明方. 大数据与生态史: 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J]. 清史研究, 2015(2): 67-82.
- [17] 叶宗宝. 期待人文视野下的灾荒史研究——中国灾荒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J]. 晋阳学刊, 2008(6): 11-17.
- [18] 孙语圣, 徐元德. 中国近代灾荒史理论探析[J]. 灾害学, 2011(2): 114-119.
- [19] 夏明方. 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J]. 史学月刊, 2004(3): 16-18.
- [20] 王鑫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丁戊奇荒”研究综述[J]. 防灾科技学院学报, 2009(4): 109-114.
- [21] 张帆. 民国灾荒史研究中一块尚待深入的领域——1934年东南旱灾研究综述及展望[J]. 高校社科动态, 2016(2): 26-33.
- [22] 苏全有, 郑伟斌. 李文海与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述评[J]. 防灾科技学院学报, 2008(4): 100-105.
- [23] 陈旭楠. 近代中国灾荒史再研究——以夏明方先生及其研究为例[J]. 防灾科技学院学报, 2013(4): 92-98.
- [24] 库珀. 如何做综述研究[M]. 刘洋,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序言.
- [25] 薛辉, 陈亚南. 继承与创新: 近30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概述——环境社会学的思考[J]. 防灾科技学院学报, 2014(2): 84-93.
- [26] 周琼. 灾害及其防御、应对——“西南地区灾荒与社会变迁”暨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C]//周琼, 高建国. 中国西南地区灾荒与社会变迁: 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10.
- [27] 编者按[J]. 史学月刊, 2014(4): 5.
- [28] 江伟. 建国以来广西灾害史研究述评[J]. 广西地方志, 2007(6): 32-36.
- [29] 池子华, 张丽萍, 王丽萍. 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M].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2: 1.
- [30] 傅衣凌. 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开幕词(代序)[M]//叶显恩. 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2.
- [31] 唐力行, 徐茂明. 从区域研究到区域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J]. 社会科学, 2008(4): 152-161.
- [32] 周琼. 环境史多学科研究法探微——以瘴气研究为例[J]. 思想战线, 2012(2): 64-69.
- [33] 李金铮. 向“新革命史”转型: 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J]. 中共党史研究, 2010(1): 73-83.
- [34] 邓京力.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的应用[J]. 史学月刊, 2004(12): 81-88.
- [35] CODATA 中国全国委员会. 大数据时代的科研活动[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概述.
- [36] 余新忠. 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灾荒研究刍议[J]. 史学月刊, 2014(4): 5-9.
- [37] 马建强. 计算历史学: 大数据时代的历史研究[J]. 学术论坛, 2015(12): 99-105.
- [38] 李红梅. 大数据时代对历史研究影响刍议[J]. 北方论丛, 2016(2): 77-79.
- [39] 姜义华. 大数据催生史学大变革[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4-29(B05).
- [40] 包伟民. 论当前计算机信息技术对传统历史学的影响[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2): 1-9.
- [41] 陈洪澜. 论20世纪科技发展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J]. 史学月刊, 2001(5): 21-28.
- [42] 汪婧. 冷战史研究的互联网资料利用问题[J]. 史学月刊, 2008(2): 121-126.
- [43] 王文涛. 信息时代的文献阅读和史料检索[J]. 史学月刊, 2015(1): 11-14.
- [44] 汤红娟. 信息时代中共党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研究[J]. 江汉论坛, 2015(3): 119-122.
- [45] 朱绍侯. 专家解读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史学研究大变革[EB/OL]. [2015-9-21].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5-09/21/c_128250020.htm.
- [46] 梁晨, 李中清. 大数据、新史实与理论演进: 以学籍卡材料的史料价值与研究方法为中心的讨论[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5): 104-113.
- [47] 陈争平. 大数据时代与近代经济统计研究[J]. 量化历史研究, 2015(1): 222-237.
- [48] 龚为纲, 罗教讲. 大数据视野下的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瓷器与茶叶的文化影响力为中心[J]. 学术论坛, 2015(12): 82-91.
- [49] 周琼. 定义、对象与案例: 环境史基础问题再探讨[J]. 云南社会科学, 2015(3): 88-95.
- [50] 王鹤. 数字化史料与史学研究效率[J]. 北方论丛, 2016(2): 75-77.
- [51] 李文海. 进一步加深和拓展清代灾荒史研究[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6): 1-5.
- [52] 吴玲. 大数据时代历史学研究若干趋势[J]. 北方论丛, 2015(5): 68-70.